

上午喝了一杯龙井,三泡有余香。中饭后开泡雅安黑茶。是哪一年,我去四川,给一家保险公司的员工与客户上课。上一堂生活摄影课。课上得——哦,当然不怎么样。但离开时,与一位摄影家朋友初次认识,他说自己刚从雅安回来,要送我一点茶叶,一个竹编篓子。因赶行程,我就拎着去了机场,上了飞机,一路拎着这个竹篓回了杭州。

我从来不讲究喝茶。有什么喝什么,无非是投入玻璃杯中,沸水一冲,喝完倒掉。有时嫌茶叶费事,白水也喝了多年,喝着津津有味。我到家打开竹篓,里面是用黄色手工纸包的小茶包,四四方方,腐乳一般大小。一篓约有几十方。试喝过一回,倒在杯中都是碎末,黑乎乎的也不怎么好看,就放下了,一直丢在角落。

放了多少年了吧。这次,是从书堆里头找出来的。打开茶包,里头还是黑乎乎的茶叶末,一点儿没变。应该是从砖茶之类的紧压茶上敲打下来,重新包装成小包,方便泡饮。小包上贴着张小纸签,有“雅安茶厂”字样。这到底是什么茶呢,我上了茶厂的官网去看,这个茶厂,果然是专门生产黑茶。

巴蜀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必是好茶。川人大多喝绿茶。川茶的三大产区,蒙顶、宜宾、峨眉,都产绿茶。蒙顶的茶味柔和,宜宾的茶味刚烈,峨眉茶味在二者之间,刚柔并济。雅安出产的黑茶,最出名的是四川边茶,但很多人从未喝过,因为主

侘心可以追慕

周华诚

销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藏胞朋友煮的酥油茶、奶茶,都用的这种黑茶。

四川边茶,历史有一千多年,边茶又分“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造中心,产地包括雅安、荣经、天全、名山、芦山和邛崃、洪雅等市县,主要销往西藏、青海和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南部地区。西路边茶,则以都江堰市为制造中心,销往四川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和甘肃的部分地区。

喝茶,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一认真起来,老茶客们恐怕就会发笑。关于这一款黑茶,虽然我放了几年,不过是形同路人,彼此陌生得很。此次有缘相遇,加深些印象也好。我记得,以前在藏区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早晚都喝酥油茶,里面一定就是这样的黑茶了。黑茶属于全发酵茶,茶叶茶梗都有,乌黑乌黑,像是绍兴的梅干菜,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形色好讲;不像绿茶,冲泡之后,还有“目食”这一种说法。

温杯之后,沸水高冲,洗茶,继而再冲。过一会儿出汤,茶色明亮(茶汤中的黑渣渣就选择性忽视了)。香气不高,但是醇正。饮了一口,居然很意外,口味可以,一点没有苦涩感,入喉润滑。细品之下,还有老茶的香气——是不是叫“陈味”,我不知道。

有的人说,边茶因为原料并不

优异贵重,茶的口味也就一般。而我喝了三泡,却对这茶益发喜欢起来。朴素是朴素的,滋味却很周正平和。这有点像我们老家,从前山里人自己制的粗茶,常常是些老茶梗,登不了大雅之堂,却受山人喜欢——他们还嫌龙井、紫笋之类的太淡呢,完全喝不过瘾。几泡之后,茶汤依然黄褐明亮,滋味醇香,揭盖看叶底,棕黑粗老,一派侘寂之色。

黑茶是“刮油”的,利消化,肉食者可以多喝。这段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只是坐着。坐久落花多。朋友看我写饮茶的文章,就和我开玩笑,说整天就喝茶这么一件事么,是不是闲得发慌。不不不。其实忙得很,要听课,要看书,要嗑瓜子看电影,要做运动,还要琢磨一日三餐吃什么,还有,要喝茶。喝茶是把茶盘放在电脑边上,电脑上开着两三个文档,这边写几句,那边写几句;饮茶笔记也是这样,一杯茶,几行字,一杯茶,又几行字——如此而已。

我现在喝茶,也依然不十分讲究。没有寂静幽暗的茶室,没有雅致的瓶花与茶席,也没有用贵重的铁壶与精美茶器。即便是茶吧吧,也是普通的茶。这使我想起《茶道六百年》的一个故事。珠光大师有位弟子叫善法,他连茶釜都没有,更别说茶具了,只有一个用来烫酒的小锅。他用这口小锅烧水,做饭,也用它煮茶。就是这位茶人,深得珠光大师的赞赏,并被记在《山上宗二记》中——所以,我想,茶怎么喝不重要,喝茶喝茶,唯其侘心可以追慕。

有一个黎明,太阳还在酣睡,窗外一片漆黑。我挣扎着醒来,望着一堆书和没有关的电脑,突然想:我的文章不会长出发白,生出皱纹,会不会疲惫、衰老?那一天,我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让闹钟叫起自己,为了不影响家人,我还是睡在客厅……多少年来,这样赶稿子早已习以为常,像打仗一样,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兴奋又紧张,时刻准备扣动扳机。我也曾有前途茫茫、怅然若失、心里空荡荡的无力感;又像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赶路人,停下来片刻,长叹一口气,还得默默地向前进。

写作就是这样子,腰酸、脖子痛、疲乏不堪,然而,从未想到要放下那支笔,仿佛是宿命,不能不写,不得不写。夏目漱石的夫人夏目镜子在《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一书中写道:“看他写东西的时候,似乎心情极为愉快,最晚时会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或是深夜一点左右。”“特别是像熬夜,还有那种让旁人看着揪心的创作痛苦,他都完全没有。”我不敢妄自比附,这种感觉的确是舞文弄墨者共同的。倘若没有快乐,只有苦熬,谁会长年累月自虐呢?不过,这种快乐或许只有写作者本人才能体会得到。

苦恼不是没有:时间不够用。交稿期限到了,过了,我还拖着。我还有很多材料没有看仔细,还有不少地方需要仔细修改,为什么不能让我从容地写来,偏要设置一个时间头像悬在头上的剑?巴金在《谈〈憩园〉》中说到抗战时期他写小说:“我记得有一夜在北碚一个旅馆里续写《憩园》,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段蜡烛,我的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得到一支蜡烛,或者一盞油灯,让我从容地写下去。可是在那样的黑夜,要找到一线亮光也实在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也像这样,多么盼望

能多一支蜡烛,多一刻时光啊。然而,时间残酷,限度无法冲破,为了这个,必须舍弃那个。好在,人到中年,舍弃,丢开,甚至是告别,已是寻常事。因为,不接受,你又能怎么样呢?

当我把这些过去的足迹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书的时候,面对这些长长短短的题目,眼前出现的不是文字,而是很多具体的情境:夜深人静的晚上,鸟儿欢叫的清晨,嘈杂的地铁上,旁边人在呼呼大睡的机舱中,许多人高谈阔论的会场里……我身在此,思绪却早已飞到另外的世界中。在一个情境中,我心不在焉,却又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心花怒放。这或许并非我的本意,扑棱棱草绿了,呼啦啦花开了,年年岁岁,我也想悠闲漫步,实际上,只能从书斋中往楼下望一望。别人寻春踏青游山玩水,我困居斗室读书写作,不是为了经国大业,更谈不上谋取什么,自我选择的习惯而已,那么它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自得其乐。

乐在其中,没有激动,没有欣慰,只有一点儿韶华逝去的感慨。偶然看到周敦颐写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他是“不知春去”,而我,仿佛春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

这样也好,春天是广阔的,博大的,并不缺我一个人。春天是灿烂的,丰富的,可是有哪一朵花是为我开的,哪一只杜鹃是为我吟唱的呢?夜来风雨声,花落有多少。还是闲坐小窗读《周易》,任他春来春往吧。至于这些文字,能发芽的发芽,能开花的开花,送出去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点点杨花入砚池

周立民

画里画外的东坡赤壁

彭华

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走出御史台监狱,即将踏上目的地为黄州的漫长旅程。此时的他尚不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能重归玉堂,然后在更偏远的惠州与儋州获得新的“功业”。

与御史们设下的生死劫难相比,这看起来是无比宽宏的浩荡恩典;而较之大理寺、刑审院的裁决与复核,却是来自皇帝的法外“特责”。

从通过制科考试的未来宰相候选人,沦为一个权力场之外的戴罪之身,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此渺茫,苏轼必须重新在天地万古之间找寻安顿自己生计、安放自己心灵的所

在。于是有了“东坡”,有了东坡居士在“赤壁”的追问与歌唱。经此一遭,自由肆意的灵魂渐渐被锻造出壁立千仞、百折不回的韧劲与力量。三国周郎的赤壁已是不可复现的风云际会,后世文人不断从东坡赤壁中汲取自身存在的共鸣与启示,这为文学史与绘画史留下了层层叠叠的回声。中国艺术研究院王一楠博士的《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从文本与图像的关系切入,讨论了美术史上的东坡赤壁。

《同绘赤壁》调查了北宋到明代近百幅真伪混杂的赤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叙事性的表现以李公麟(龙眠)为起点,写意山水长卷则可追溯至司马王诜(晋卿)。两位与苏轼曾有过密切交往的画家,他们的《赤壁图》早已不可复见,由二人其他传世作品的风貌与明代为主的文献记载构想它们可能的面貌,提供了美术史上一种迷人的或然性。

以东坡赤壁为主题的叙事画较为罕见,跟着《同绘赤壁》,便不会错过宋代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创作中的诸般巧思——譬如地上的人影、屋中坐卧东坡的同时在场,尤其是《后赤壁赋》中本未出现的马厓与马匹等。加之配文与题跋、印鉴的解析,使得围绕这卷《后赤壁赋图》生成与传藏的种种人与事——自称“苏轼出子”的宦官、深受苏轼知遇与连累的宗室、受汉文化熏习陶染的蒙古国官员与情牵故国的大宋遗民,毕现于目前。

要之,《同绘赤壁》兼具问题意识与可读性。在美术史方面,展现了精密的图像分析与阐释技巧;在美学方面,“决定性瞬间”、山水本体叙事等概括醒人耳目。其论述中处处留意书画研究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真伪问题,亦展现了严谨的思辨与扎实的学术功底。

于我而言,自由又强大的东坡居士永远是亲切而治愈的存在,关于他的有趣探索值得被记录与传颂。

老游记里的风物人情

黄政一

《白杨礼赞》小时候就拜读熟读,茅盾这篇写于1941年3月的经典之作不知感染鼓励了多少读者,因为“白杨树是不平凡的”。近拜读翁兄长松花费20多年集访书搜书编书写书于一身的《旧平装游记过眼录》,偶然间又发现一个秘密,《白杨礼赞》被收入茅盾著、1943年4月桂林初版的《见闻杂记》,上海文光书店出版。长松先生看到的已是该书的第五次印刷本,累计印数达14000册。该书141页,收有《兰州杂碎》《西京插曲》《市场》《“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雾重庆”拾零》《新疆风土杂忆》等18篇,忠实记录了茅盾关注社会和民生的所见所闻,点点滴滴聚拢成这一本抗战时期的畅销书。

《旧平装游记过眼录》所收的海内外游记都是20世纪“上半场”由社会各界人士倾情奉献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方既陌生又熟悉,或光耀至今或荡然无存,但不管怎样那些文字、照片、广告留下了。赵君豪著《游生琐记》中居然安放了23张各行各业广告,真是朋友四海,纷至沓来,令人大开眼界。

上海人欢喜旅游,而且有出典。1923年8月1日,陈光甫先生当家的上海银行旅行部宣告成立,亦是中国首家旅行社。1927年它更名为中国旅行社,并创办《旅行杂志》。隔年1月拿到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制服整齐,手面清洁,笑脸迎客。为了更好地拓展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设平价招待所,里面严禁喧哗,枕套毛巾被褥卫生整洁,热水供应,并提供便餐。1931年又推出旅行支票,附送皮夹一只。在营销手法上又创新了一次。1936年,中国旅行社推出一本赵君豪著的《南游十记》,书中插图广告达44幅,各行各业,琳琅满目。另外推出的“旅行丛书”7种,《上海导游》《青岛导游》《四川导游》《西北导游》等指点迷津,贴心贴肉。

翁长松先生既舞文弄墨又是旅游专业人士。他“抢救”出这样一本“奇书”,值得带上在旅行时或闲暇时翻翻,偶然“风景”若是撞了车,那倒真是一次小确幸小欢喜。



秋菊 (中国画) 俞伟

个子不算高,未开口先眯着眼笑,温暖而磁性的男中音叩着耳膜,闭上眼睛我都能沐浴在这“老东特供”所营造的温馨气氛里。

老哥姓束,已逾古稀,我国知名的地下空间专家。老哥是摄影超级发烧友,因为热爱,每每看到新奇的照片、美好的场景,都要发我分享:盛夏的山涧、1973年的上海外滩(彩色)、人民公园盛开的牡丹、世界十大博物馆、潍坊风筝、新西兰的草原森林等,有的来自网络,有的是他拍的,看得人心田里尽是天光云影在摇曳。

这些年,他不停地奔赴自己的摄影“山海”。我们一起去旅游,他发现一处好设计,立刻奔趋而至;看到一处好风景,仿佛拂射击般,立定,手举相机,眯着眼歪着脖子对焦;介绍贝聿铭设计的美秀美术馆,他的眼睛里写满了崇敬。

老哥游走在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一会儿对准一个角落,比画着;一会儿疾速奔向刚发现的“新大陆”,自顾自,举起相机一顿拍。一番“收割”之后,看见我,握着相机上的钮,走近:“这张咋样?”他说,岩石底下开地铁,不容易,能把地铁打扮得这么俊俏,也是书写了奇迹。他一张张翻过去,中央车站、公园车站、蓝蓝的橄榄枝、热闹的奥运会……他那满

足的表情告诉我:此刻,这位地下空间老专家很满意。

北极圈的夏日,太阳几乎全勤,天幕的种种奇景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可惜是阴天,啥也没拍到。”一天早上,老哥怏怏地对我说。停了片刻,说了句“明天早上再试试”。我笑着,他的眼里有光,仿佛看到了漫天霞光。想拍北极圈里的日出,得起多早?不说您也知道。

他用相机探美

程国政

摄影烧钱,人尽皆知。20年间,他换过的相机大概有五六部吧,每当心仪的设备面世,他便心念装备升级,然后与家中的“人民”软磨硬泡,那是需要施展脑筋急转弯、明修栈道之类智慧的。后来手机拍摄功能精进,他开始进入摄影新“阵地”。这不,他发我手机拍摄的牌坊,通体似玉;那红体灰尖双双刺破了苍穹的塔,是教堂。原来,老哥夫妻俩炎夏烈日里去了徐家汇教堂及东西公园,他告诉我:“书院下的东西公园太有创意了,你可以来看一下。”我说:“城市探奇达人!”他立

刻发来一张图,图中大书“东西公园”:半透明的空中“幕遮”里外四层、半透明,如一只正在空中忽闪的透明水母,那是公园的门楣,老哥微信我:“这是我在徐家汇书院拍得最满意的照片,发给你分享。”很快,第二条来了:“这是书院地下一层中设置的‘东西公园’,值得一去啦!”他一如往常,发现美好,便对我吹响同赏的号角。

忽一日,束老哥“突突突”连发数张:晚霞把远远近近、高低参差的楼一色地镀了一层金,天幕咧开了嘴,红晕下的“皓齿”为这些楼衬上白净的帐幔,映得幕面上那“金”愈发耀眼、喜庆;逆光的楼房,屋顶上的棚透出云后的光,远处赤白米黄的天光,近处乌泱泱的房,让人有种“离离原上草”送君长亭外的凝重,“这是我昨天傍晚和今天早上在家中的前窗和后窗,用照相机拍摄的图片,发给你分享。”原来,他手机、相机是轮流值班的。

最美热爱是沉醉。隔着屏幕,我都沉浸在他那幸福感拉满的热爱海洋里。

十日谈

花样爷爷

责编:郭影 王瑜明

明起请看一组《我和上影演员剧团》,责编吴南瑶、孙佳音。